

『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丛书

# 红楼梦

的

# 现代误读

陈文新著



齐鲁书社

# 红楼梦

的

陈文新 著

现代误读



齊魯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的现代误读 / 陈文新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9

ISBN 978-7-5333-2054-6

I. 红… II. 陈…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9431 号

## 《红楼梦》的现代误读

陈文新 著

---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 16

印 张 15

字 数 202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054—6

定价: 28.00 元

---

# 总序

## 『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丛书

陈文新

“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这一现象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必然后果。其中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学术的原因。

先说文化的原因。

在 20 世纪的文化生活中，有一个口号是特别响亮的，即“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别小看了这五个字，它意味着中国数千年的精英传统已失去尊严。读鲁迅的《阿 Q 正传》，我们只觉得老庄和道家受到了嘲笑；而同样是鲁迅所作的《狂人日记》，则让孔子和儒家成为“当时政治、民俗、社会中的一切丑恶”（郭齐勇语）的殉葬品。儒家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流意识形态，曾经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感，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

《『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丛书》总序





置疑的事实是，“中国的脊梁”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文天祥绝不可能料到的是，在他心目中如此神圣的四书五经，有朝一日会被打倒在地。这太不可思议了，然而竟是事实。其后果之严重，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试想，连“孔家店”也可以打倒，中国数千年的精英传统中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打倒的！“打倒”一词在20世纪出现频率极高，它意味着一种“破字当头”的文化心态和文化姿态，意味着对中国数千年精英传统的不屑一顾。

说到“打倒孔家店”，还要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五四”文化人虽口头上高呼“打倒孔家店”，其实大有言不由衷之处，他们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崇高的敬意，并具备足够的“同情之了解”的能力。胡适就明确说过，别看他是“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之一，其实他骨子里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信奉者。为什么会言不由衷呢？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的一段补充说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事实。林语堂说：“中国今日政治经济工业学术，无一不落人后，而举国正如醉如痴，连年战乱，不恤民艰，强邻外侮之际，且不能释然私怨，岂非亡国之征？正因一般民众与官僚，缺乏彻底改过革命之决心，党国要人，或者正开口浮屠，闭

口孔孟，思想不清之国粹家，又从而附和之，正如富家之纨绔子弟，不思所以发扬光大祖宗企业，终日数家珍以夸人。吾于此时，复作颂扬东方文明之语，岂非对读者下麻醉剂，为亡国者助声势乎？”原来如此。这提醒我们，“五四”文化人对传统的敬意是深藏内心的，而他们对传统的批判则“怒形于色”。他们对传统的批判“力度很大”，却不一定代表他们真实的态度。他们的批判带有借题发挥、指桑骂槐的意味。“他们所处的环境特别恶劣，不仅是内忧外患，尤其是启蒙所遇到的强大阻力。他们的矫枉过正其实也是被腐朽的孔教喧嚣逼出来的。”（郭齐勇：《儒学与儒学史新论》第313页，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版）

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五四”文化人的退场，在“新文化”以及“后新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20世纪中后期的几代文化人，情况便更加令人难以乐观。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可以说，他们不只是在口头上高呼“打倒孔家店”，在内心里也对“孔家店”充满了蔑视和愤怒。以我们这一代人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上中学的年纪。那个时候，我们总是称孔子为“孔老二”，提到“儒家”、“宋明理学”、“仁义”、“圣贤”等术语，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产生一种厌恶感。对中国数千年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系统——儒家，以及与之互补的道家，我们已习惯于嗤之以鼻，或批判，或鄙夷，总之，是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面对垃圾的态度。

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20世纪中后期的“批林批孔”等运动，“批孔”的措辞一以贯之，而对孔子的批判心态则日渐强化，由最初的“言不由衷”变为了几代人的习惯性态度和讨论问题的大前提。是定论，是真理，它本身不再需要证明，倒成了判断其他论述的标尺。在这样一种批判传统、蔑视传统的社会氛围中，在中国数千年精英传统失去尊严的境况下，对中国古典名著的误读就不可能只是个别现象，就不可能只是偶然现象。因为，中国古典名著本来就是中国数千年精英传统的主要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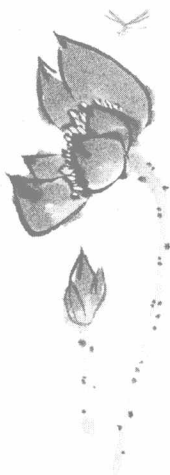


再说学术的原因。

2001年至2006年，由我主持，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专家的鼎力协助下，我们编纂出版了中国首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谈到编年史这样一种文学史范型的兴盛原因时，我特别强调：“这是现代学术负面后果所导致的一种回应。”我在《编年史：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一文中指出：

与传统学术相比，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强调诗、文、小说、戏曲才属于文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一是治学方式的变化，强调叙述和论证的条理化和逻辑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缺憾。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以现代文学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定义来衡量古代的文章，很大部分难以对应……古代散文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薄弱环节，有的文体、有的作家之所以会被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有的作家原是诗文均精而文学史上却只讲其诗不讲其文，种种现象无论在文学通史抑或在断代史中都存在着，且均与此有关。而这对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探索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显然是不利的”。（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第267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就治学方式而言，伴随着对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追求，大量现代术语被视为论述的基础，而这些现代术语很难与古代的文学范畴对接，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现代论述很难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比如，我们将六

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都划入“散文”范畴之内，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骈文以抒情为目的，以写景和骈俪辞藻的经营为表达上的特征，轻视说理、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文以说理或寓含真知灼见为目的，以论说和叙述为表达上的特征，通常排斥或不太注重写景及骈俪辞藻的经营；小品文在忽略骈俪辞藻的经营方面虽与古文相近，但小品文并不重视说理，并不致力于思想的深刻，它着力表达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情调。在面对这三种传统文体时，相当多的现代学者不去关注各自的体裁特征，而习惯于以评鉴现代散文的方式来加以论述，结果张冠李戴，未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又如，我们将诗（古诗、近体诗）、词、散曲都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之外。中国的古典诗（古诗和近体诗）以面向重大的社会人生为宗旨，私生活感情是受到排斥的题材，宫体诗和香奁诗即因以女性为描写重心而成为众矢之的。与古典诗的题材选择形成对照，词的题材重心则是私生活感情，重大的社会人生题材反而被认为不宜用词来写，或者，在用词来处理时必须予以适当的软化。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写到周瑜的风采时有意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来加以点缀，即属于典型的软化处理，其风格与刚性的诗存在显著区别。散曲的题材重心是“隐逸”和“风情”，其“隐逸情调”与古典的山水田园诗有相通之处，其“浪子风流”与恋情题材的婉约词有相通之处，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仍不容忽视。一般说来，古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散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讲究含蓄就不可能成为散曲正宗。一部分现代学者习惯于以文学理论中的诗论为理论前提，“一视同仁”地解读古代的诗、词、散曲，出现阐释错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由此建立的“文





学史规律”，自难严谨切题。

我在《编年史：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中只讨论了文学学科的问题。实际上，在其他学科，“现代学术的负面后果”也随处可见。例如哲学。193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随冯著刊行。在这篇审查报告中，陈寅恪不点名地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了批评：“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确实，中国古典哲学名著的误读现象至少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误读现象同样触目惊心。“现代学术”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日积月累，已到了必须认真对待并加以系统清理的时候。

“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这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也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出版一套《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丛书》，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齐鲁书社的领导热情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其眼光和气度，确乎不同寻常。“齐鲁”是中国数千年精英传统最重要的发祥地，《“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丛书》在齐鲁书社出版，这一巧合包含了颇为美妙的意味。谨祝齐鲁书社的声望蒸蒸日上，也期待这套丛书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2月23日

于武汉大学

# 自序

陈文新

读《红楼梦》，我经常想起一个人：魏晋时期的阮籍；同时会想起一个短篇小说：晚明无名氏的《小青传》。

阮籍是魏晋时期的奇人之一。他邻居家有个女孩，才色过人，没出嫁就去世了。阮籍与她家并无多少交往，却赶去痛哭了一场，哭得非常伤心。有人批评他任诞不检，其实是不理解他那哲人的胸襟。阮籍所悲伤的，是青春的摧折，是美的凋谢，是生命之流的突然中断。一个美丽的才情不俗的女孩子，突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能不为之黯然神伤吗？

《小青传》所表达的情愫亦可作如是观。红颜薄命是个永恒的主题。青春与生命的短暂，芳时难留，烟景不再，任何一次美的零落都会触发难言的愁恨。小青在作者笔下就是美的象征。她的早逝令作者不胜其悲，惋惜她不能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那样在牡丹亭畔重生。

并非偶合，小青有一首读《牡丹亭》的绝句：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人间自是有情痴。在这一点上，小青和杜丽娘太相近了。杜丽娘游后花园，曾感叹：“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表面是说风景待人欣赏，其实是说自己独处深闺，这美丽的容颜不知为谁而存在。杜丽娘的悲剧也正是小青的悲剧。她“风期异艳，绰约自好”，却嫁给不知怜香惜玉为何物、憨跳不韵的某生，致使小青横遭妒妇的摧残，才十八岁便成为一缕芳魂。她能做的唯一的努力是将其真容经由画师之手留在世上，然而，就连她的画像也差点被妒妇烧掉。无怪张潮会这样说了：“红颜薄命，千古伤心。读至送鸩、焚诗处，恨不粉妒妇之骨以饲狗也！”

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美的东西总是短暂的。繁华是短暂的，生命是短暂的，青春是短暂的……对于一颗敏感的心灵，沧海桑田、盛衰无常是足以激发悲怆之情的。阮籍如此，汤显祖如此，孔尚任如此，曹雪芹也是如此！作为例证，我们可以读读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中的一段，一个隐居者满怀惆怅地向观众唱道：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难丢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这种浓重的兴亡之感，也可以说是一种幻灭感。的确，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如此地容易毁灭，我们个人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我们能把握住什么？我们焦虑，我们惶恐，我们惴惴不安……在对社会整体的忧虑中，也包含了对我们自身的忧虑。所以鲍照在《芜城赋》结尾感慨：千秋万代，古往今来，人皆有死，尚复何言。一方面是华屋山丘，另一方面是人生无常，两种情怀

在某一点上是可以汇合的。

不理解阮籍和《小青传》的人，也是难以理解《红楼梦》的。或者说，他们很容易误读《红楼梦》。

不理解《芜城赋》和《桃花扇》的人，也是难以理解《红楼梦》的。或者说，他们很容易误读《红楼梦》。

## 二

读《红楼梦》，我经常想起一个典故：“雪夜访戴”；同时会想起一篇散文：晚明张岱的《湖心亭赏雪》。

“雪夜访戴”是与雪有关的一个玲珑剔透的故事。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子猷住在山阴，一天夜里突降大雪，他从睡梦中醒来，开门叫拿酒来喝。举目四望，一派洁白，相互映发。不由得起身徘徊，吟诵左思的《招隐》诗，蓦然想起戴安道来。戴远在剡溪，子猷当即坐小船去寻访他。船行一夜方到达剡溪，他却未进戴门，又掉转船头回到山阴。人问其中的缘故，他说：“我本乘兴而来，兴致没了就回去。何必一定要见老戴呢？”

乘兴而来，兴尽而返，魏晋名士的这种做派，也和雪景一般爽朗，令人耳目俱明。张岱和他的《湖心亭赏雪》中的金陵人大约可以与王子猷并辔齐驱。只是，张岱不那么任诞，而多了几分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自在安闲。初更时分，他划着小船独往湖心亭看雪。孤独吗？那位高吟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是可能感到孤独的。至于张岱，以“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为背景，他体验到的却是诗情画意，连他自己，连他自己坐的小船，也都成了风景。尤其富于情趣的是，还有一位金陵人拉他同饮。当然，船夫对这种韵味盎然的情景是不理解的。这便是诗人和非诗人的区别。诗人袁枚曾在《随园诗话》卷九引王西庄的话说：“所谓诗人者，非必其能

自序





吟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齷齪，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连篇累牍，乃非诗人矣。”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张岱是诗人（虽然他几乎没摆弄过诗），那位金陵人是诗人（我们确信他没有写过诗），王子猷也是诗人（尽管他仅以书法家为后世所知）。“莺花日办三春课，风月天生一种人。”诗是远于尘俗的。

什么时候，我们也到湖心亭看雪去！

什么时候，我们也用“雪夜访戴”和“湖心亭赏雪”的心境来读《红楼梦》！

没有王子猷和张岱这种超脱的心境，误读《红楼梦》就非常有可能。

### 三

读《红楼梦》，我经常想起清代中叶的袁枚，想起袁枚的《随园诗话》，想起《随园诗话》关于艺术情调的讨论。

《随园诗话》卷十五第四一则说：

诗有听来甚雅，恰行不得者。金寿门云：“消受白莲花世界，风来四面卧中央。”诗佳矣，果有其人，必患疟症。雪庵僧云：“半生客里无穷恨，告诉梅花说到明。”诗佳矣，果有其事，必染寒疾。

袁枚所说的“诗有听来甚雅，恰行不得者”，与王禹偁《黄冈竹楼记》所说的“骚人之事”有相通之处。“骚人”，就是诗人。诗人的情怀总是与实际生活不太合拍的。“酒色放荡，礼法所禁，一也；意象空虚，不踏实地，二也；颠倒议论，非圣非法，三也；议论杳渺，半不可解，四也；触景偶发，非有指譬，五也。”（明谢肇淛《小草斋诗话》）

但诗人与诗情毕竟是这个世界所不可缺少的。《随园诗话》

卷一第四八则说：

有妓《与人赠别》云：“临歧几点相思泪，滴向秋阶发海棠。”情语也。而庄荪服太史《赠妓》云：“凭君莫拭相思泪，留著明朝更送人。”说破，转觉嚼蜡。佟法海《吊琵琶亭》云：“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眼泪哭苍生。”一般杀风景语。

袁枚批评庄荪服、佟法海杀风景，是指他们话虽然说得有理，但却破坏了艺术的情调，使人扫兴。真话、实话不一定有趣、有味，因此，无理有情，愈痴愈妙，虽无实际的用处，却给人生增添了几分超逸的色彩。人只有在诗情中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就这个事实而言，一个人惯作“杀风景语”，我们可以承认他聪明，但只是焚琴煮鹤的聪明。虽然当事人自以为条条有理，头头是道，而给读者带来的却是美感的丧失。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在《红楼梦》研究中，“杀风景语”比比皆是。其数量之大，也许只有“《周易》研究”才能与之相提并论。于是有了《〈红楼梦〉的现代误读》一书。

是为序。

2008年2月23日

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 题 记

在本书里，“现代”指“现在这个时代”，即从1919年到现在。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从传统到现代，强调的是文化范型的转变。一般认为，这种文化转型在晚明就已开始，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加快了转型的进程，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标志着现代文化主导地位的确立。本书所讨论的《红楼梦》误读现象，大都发生于1919年之后，且或隐或显地带有现代文化的烙印，1919年之前的种种情形，只有少数特别重要的事例受到我们关注。

胡适是新红学当之无愧的宗师。新红学的学术范式由他建立，而《红楼梦》的现代误读，如种种“揭秘”、种种“解梦”，也不幸与其负面影响有关。本书以胡适为主要批评对象，对于周汝昌、俞平伯、刘心武等先生，则重在明其渊源，示其流弊，以免浪费笔墨。

话休絮烦，言归正传。

 **目录**  
CONTENTS

总序 / 1

自序 / 1

题记 / 6

第一章 “新文化”视野下的价值判断 / 1

——“《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

一 《红楼梦》与西方相遇 / 3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 陈铨《叔本华与红楼梦》 / 陈铨《尼采与〈红楼梦〉》

二 胡适的断语：『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 / 8

『《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 / 站在《儒林外史》的立场看《红楼梦》 / 一看贾宝玉的人生观 / 二看《红楼梦》的题材选择与题材处理 / 胡适认可富于理性的、有责任感的生活

三 虚拟情境：胡适与诸位红学家对话 / 22

第一例，吴宓《红楼梦新谈》 / 第二例，王小隐《读红楼梦刺语》 / 第三例，佩之《红楼梦新评》 / 第四例，虚白《红楼梦前三回结构的研究》 / 第五例，李辰冬《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 / 第六例，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 / 第七例，陈铨《叔本华与红楼梦》 / 第八例，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 / 第九例，周华《林黛玉——从一个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者看中国式的贵族生活》

四 胡适的误区：以判断代替理解 / 80

胡适说『《红楼梦》毫无价值』 / 陈寅恪倡导『了解之同情』 / 胡适的学术路数：以判断代替理解 / 文革期间的『影射史学』 / 鲁迅与胡适之比较

第二章 “科学主义”旗帜下的“新红学” / 73

- 一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奠基 / 75  
胡适宣告『旧红学』破产 /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 / 《红楼梦考证》是划时代的红学论著
- 二 『新红学』只关心作者问题和本子问题 / 77  
胡适划定『新红学』的研究范围 / 周汝昌《什么是红学》 / 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 三 胡适的『科学』情结与『新红学』的『科学方法』 / 82  
胡适借《红楼梦考证》推广『科学方法』 / 顾颉刚为《红楼梦辨》作序 / 『科学』吞并『人文』 / 胡适强调《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 / 胡适『科学方法』的局限
- 四 胡适的『自传』情结与『新红学』的『自传说』 / 86  
胡适提倡写自传 / 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 / 胡适鼓励人记他的言谈 / 胡适是口述史学的热心支持者 / 《红楼梦考证》与胡适偏爱自传的个人趣味 / 胡适、顾颉刚等对《红楼梦》作辨伪研究 / 从『自传说』到『曹学』 / 与『曹学』有关的八个红学事件 /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 周汝昌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 / 俞平伯对『自传说』的反省
- 五 从胡适对《红楼梦》『文学技术』的贬抑到矛盾的『尽量删削』 / 131  
胡适以理性克制个人趣味 / 胡适说《红楼梦》的『文学技术』比不上《海上花列传》 / 茅盾将《红楼梦》删减为《节本红楼梦》 / 我看『《红楼梦》』的神秘氛围、诗意与写实